



图①马骏生前照
图②南开大学1919年开学典礼照
图③天津总商会旧址的廊柱
图④马骏诗作《送李愚如赴法》
(天津市档案馆馆藏)

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里,静静矗立着两根圆柱。它们近三米高,粗不盈尺,原本是天津总商会旧址的廊柱。柱身斑驳,深色大漆裂出水波般的纹路,像一段历史沉默的回声。而它们身上最深的印记,来自百年前,一位青年的决绝一撞。

热血青春

(一)

1919年6月,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,也激荡着天津。围绕是否继续罢市,天津总商会内争论不一。

有商董质问学生代表马骏:“你家中无财产,怎知有产者的困难?”马骏凛然回答:“性命与财产孰重?学生无财产,愿以性命报国家!”话音未落,他猛然撞向厅中木柱,血流如注。

这一撞,柱身的裂痕、旧色和斑驳,都成了历史留下的伤口,也留下了一个追问:一个青年,为何愿把生命押在一场商会的争论里?

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王永立,四十年来躬耕天津党史。他觉得要理解马骏,首先要理解那时的天津。他说:“清朝末年,国家蒙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。在这种背景下,一些先进的中国人,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洋务运动,包括洋务运动后期,在天津建立了很多新式的、西式的学堂和学校,一大批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也因此进入天津。”

年轻的脚步,纷纷来到天津。南开中学“教育救国”的理念,让十几岁的周恩来和马骏先后来到这里。英文教材、理化实验、演讲会、自治会、校刊编辑部,把课堂和时代紧紧连在一起。

1919年春,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。消息传回国内,五四运动爆发。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,高喊“外争主权,内惩国贼”。第二天,北洋大学、南开中学、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天津青年学生也呼吁抵制日货、声援山东。正是在这样的风暴中,马骏走进了天津总商会。

(二)

马骏的孙女马丽颖从年少时起就随家人追寻祖父的印记。在她的记忆里,1919年对于祖父而言,注定是改变人生的一年:“当时日本的军舰都已经到天津了,所以马骏他们血溅商会,是要维护国家主权。如果山东失守,那当时的中国就亡国了。青年一代有责任替国家去扛、让中国站起来,所以他们所作所为是在救这个国家。”

尽管当时在万千学生的努力下,中国代表拒绝在《凡尔赛和约》上签字,但日本最终(既成事实的)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。9月,周恩来、马骏、邓颖超、郭隆真等二十名青年,在天津成立觉悟社。就在他们求索之际,李大钊受邀来此指导。对于李大钊来说,天津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。

1889年,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。青年时代,他也曾在从政、学商、学医之间彷徨过。左右为难之际,李大钊曾给家里写信求助,大伯父李任元让他遵循自己的意愿,并回信对他说:“要逛山你就逛高山,要游水你就游大海……”

高山、大海,这句话没有替他选定谋生的路,却替他打开了胸襟。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。

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,一张领讲义券,一册册写满批注的讲义,记录着李大钊的求学岁月。课堂里,是政理、法理和世界潮流;课堂外,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现实。在这里,他遇到了恩师、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白雅雨。从老师身上,李大钊学到了革命志士为国为民、勇于奋斗的精神。

老师为革命牺牲,学生把“救中国”刻进了心里。从天津出发后,李大钊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方略。那时,各种主义在时代激流中翻卷,他大浪淘沙般寻找、辨析、选择。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他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学说,投向最广大的人民。文章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标志着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。此后,他陆续在《新青年》发表文章

传播马克思主义,同时对天津进步团体也非常关注。

觉悟社成立五天后,李大钊应邀来到天津,与周恩来、马骏、邓颖超、郭隆真等青年长谈,让这些青年开始懂得——“救中国”不能只靠一时激愤,也不能只靠孤勇牺牲;必须到人民中去,有组织,有信仰,有能够改变旧世界的新主义。

一张南开大学1919年9月25日开学典礼的照片里,有南开的校父严修、校长张伯苓,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周恩来,就是没有马骏。当时马骏和觉悟社的另一位成员刘清扬,奔赴上海参加全国爱国联合会的成立会议。马骏缺席了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合影,却没有缺席那个时代更大的集合。1920年1月,天津学联调查员检查日货时遭日本浪人毒打。各界代表前往省公署请愿,直隶警察厅却逮捕了马骏等二十余人。1月29日,周恩来组织学生再次请愿,也被捕入狱。这就是天津历史上的“一·二九”血案。

(三)

天津博物馆收藏了马骏在狱中写给觉悟社友人李愚如的诗。

纸页已经泛黄,青春却依然滚烫:你去法兰西,我在监狱里。他日,你带着自由回来,我拿着自由迎你。不然,你就要看到一个坟儿说:我把他给你带来,你却已为他而死了。

“他们最后出来的时候,各界联合会赠送他们每人一个纪念章。”马骏的孙女马丽颖回忆道:“留日同学会又特意赠送了马骏一个特制的金质纪念章。马骏说了一句话,表明今后的自己要献身国家:进狱以前的马骏是马骏同家人的马骏,出狱以后就是国人的马骏。”

出狱之后,马骏变了,热血凝结成信仰。他和李大钊、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,改变中国不能只靠文章和呐喊,必须有组织、有行动。

1920年2月,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,经天津转往上海。海河涛声,回荡着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约定。马骏正是在这场洪流中坚定了自

己的选择。多年后,马丽颖在莫斯科档案馆里找到了印证这一选择的关键文件——一份1925年的档案:马骏受组织委派,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俄罗斯的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,详细记载了马骏的入党时间: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,192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,推荐人李大钊。

(四)

马骏始终走在那条被李大钊点燃的道路上。

1927年大革命失败,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,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志士被捕。在狱中,李大钊写道:“钊自束发受书,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,实践其所信,励行其所知。”4月28日,李大钊走上绞刑台,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。

危急时刻,马骏临危受命回国,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。在武汉,邓颖超告诉马骏,北京白色恐怖尤为严重,是否暂避?马骏非常坚定地回答:“这个时候人民需要党,我必须去!”

他知道前方等待的是什么,却仍然选择回去。几个月后,马骏因叛徒出卖被捕。他面对审讯时留下一张照片,照片中的马骏目光坦然如炬,仿佛仍是当年天津总商会里的那个青年——只是这一次,他不再用身体撞向柱子,而是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。

马骏不是孤身一人。张太雷未曾取走的毕业证书,郭隆真狱中的御寒毯,于方舟、安幸生留下的名字……都在提醒我们:一批从海河边走出的青年,像一束束火光,从天津散开,又在更大的中国汇合。

说到天津党组织的贡献,党史研究学者王永立总结道:“天津党组织1924年9月成立,不是最早成立的地方党组织。但是,天津的党员被李大钊同志派往外地发展党的组织,对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发展,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”

津渡青春,渡过的是海河,走向的是觉醒。